

文章编号:1005-0523(2011)06-0114-07

近十年国内译者主体认知过程研究

谭素琴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从“翻译过程”和“译者主体”两条路线,回顾了近十年来国内译者主体的相关研究,发现一般有两种模式:文化模式和认知模式。文化模式确立了译者认知的主体地位和普遍性,却忽略了其受动性和差异性;认知模式则主要基于心理语言学,属于探究译者语言能力的信息处理模式,忽略了译者作为“人”的社会性和非语言能力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提出将社会心理学纳入理论体系,建构一种基于主体总体性的译者翻译认知过程模式。

关键词:译者主体;翻译过程;语言认知;社会心理

中国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范式从静态的规定语言学转向了动态的描述文化研究,学界开始把视角从文本中心转向了译者中心和翻译过程。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研究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从宏观上建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而是更加关注译者在真实翻译实践中的思维活动,决策心理和语言识解,由此形成了“译者主体翻译认知过程”这一研究主题。

目前,国内对该主题的研究,依据3个关键词“翻译过程”,“译者主体”和“翻译认知”而存在三条研究路线:一是围绕翻译过程,探讨其中的双语转换规律和译者的翻译决策;二是着眼于翻译主体,借助多元文化理论阐释译者主体身份的嬗变及其确立理据,讨论翻译中多重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三是以翻译认知为中心,在心理语言学的框架下,解剖译者的翻译认知结构,由于三条路线彼此之间存在交集,本文拟以“翻译过程”和“译者主体”为切入点,将认知模式纳入其中归纳整理。

为了较全面地呈现近十年来译者主体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全貌,本文在上述两个切入点下,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论文和博硕数据库,选取了2000—2011年间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样本,对“翻译过程”和“译者主体”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希望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1 研究现状

1.1 翻译过程路线

在文化研究模式下,翻译并非是完结了的产品,而是正在进行的过程。翻译过程实际上是译者做决定和解决问题的过程^[1],是译者的心理活动和认知体验在翻译方面的映射与再现。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描述译本产生的全过程,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译本产生的根源,合理有效的解读翻译现象。

在翻译过程研究方面,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对翻译操作过程的静态描述,二是对译者思维运作过程的动态研究^[2]。静态研究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传统语言学观点下译者感悟式经验认知;第2阶段为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下译者对文本的语言认知处理;第3阶段为文化转向后基于多元理论的译者认知能力描述性研究。动态研究是伴随着认知语言学引入翻译理论而出现的,目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并

收稿日期:2011-10-24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1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JCZH152)

作者简介:谭素琴(1977—),女,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日益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管窥近十年来该研究的成果和走势,本文以“翻译过程”为主题,在文史哲和教育科学综合及信息技术3个门类中筛选出中文核心期刊共33篇,将数据按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应用研究等进行分类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11年近十年来“翻译过程”路线图下的译者认知过程研究

Tab.1 Translator's cognition studies by the route of Translation process from 2000 to 2011 /篇

研究类型	元理论研究 或理论建构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合计	%
		非言语因素	语言认知	译者主体认知研究		
宏观研究	24	0	1	3	28	84.8
微观研究	1	0	2	0	3	9.1
应用研究	0	1	0	1	2	6.1
合计	25	1	3	4	33	100

1.1.1 主要成果

从研究类型来看,宏观研究特别是元理论研究成为该路线图下的主流,共24篇。其中多元文化模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有7篇:有的是借助阐释学、目的论、互文性等对翻译过程的描述^[3],有的是从生态学视角下对翻译过程的选择与顺应进行解读^[4-5]。另外1篇文章对文化介入翻译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6],2篇论文阐释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作用或地位的建构^[7]。

文化范式下的过程研究,内容往往聚焦于三方面:一是借助各种文化理论如现象学、互文性、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对翻译过程进行描述;二是以“翻译主体”或“翻译主客体”关系为切入点,关注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及其相互作用;三是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为关键词,讨论宏观外部语境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此类过程研究绝大多数都属于宏观思辨,突破了传统语言学拘泥于具体语言问题的片面性,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文化层面,为翻译过程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除了文化视角的宏观研究,近5年来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讨论翻译过程的研究增长迅速,有17篇论文属于此类。其中3篇是综述类文章,1篇勾勒了国内国外翻译过程模式的主要成果^[8],1篇详细描述了有声思维法近20年的发展^[9],1篇归纳总结了西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现状^[10]。8篇有关翻译过程模式的文章中,4篇主要是对以贝尔为代表的信息处理翻译过程模式的评介和反思^[11],4篇是国内学者对翻译过程模式的理论假设和创造性构想^[12-14]。另外6篇文章在认知理论框架下,分别采用图示理论,关联理论,心理格式塔,心理空间理论及有声思维法对翻译过程进行了解读^[15-18]。

微观层面的过程研究,多数是基于认知语言学框架下对具体语言问题的处理决策:姬玉珊,姚璧荣^[19]分别讨论了源语对目的语的心理干扰性误差和对信息的压缩及解压,袁卓喜^[20]探讨了语块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与启示。另外,应用研究也较单薄,海芳^[21]分析了作为学习者的译者在TEM8考试中汉英词汇的策略。

认知范式下的过程研究可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利用认知科学对翻译过程进行元理论研究,理顺内部关系,确立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同时建立系统的学术话语;二是在认知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框架下分析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思维,信息处理和语言生成等。其次,研究模式主要是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信息处理,有的是借鉴国外成果如贝尔的“综合-分析”模式和基于关联理论的认知语用模式,有的是国内学者的创造性建构如王军^[12]基于Van Dijk话语解构理论、Rado翻译逻辑素的语篇解构与重构模式,郑冰寒^[13]基于Translog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和陈科芳^[14]基于语用推理机制的过程模式。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基于生态系统的翻译过程整合模式^[4];在研究方法上,译者主体的认知研究一般是宏观思辨,实证方面多采用有声思维法TAPs。

近5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的日益发展,国内在该主题下的系统研究也逐步显现,分别涉及到了翻译过程的文化问题、语言问题和译者主体性问题。苗菊^[22]利用有声思维方法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思维进行了实证研究。李占喜^[23]从关联-顺应角度讨论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意象。宋志平^[24]采用选择-顺应理论探

讨了翻译过程中的语用现象。刘雅锋^[25]分析了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1.1.2 问题与反思

翻译过程作为一个系统,涉及了语言、文化、译者内部心理和外部语境等。目前,无论是文化模式下还是认知模式下的过程研究,总体上都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首先,从研究类型来看,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从研究对象来看,语言认知多,非语言认知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内省思辨多,实证实验少。

一方面,文化模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大多属于宏观描述,微观层面上主要倾向于探讨该过程中的翻译主体间性或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决策过程。有的研究也试图从外部语境着手,分析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或操控,但绝大多数没和该过程中的译者主体建立起一种完整关联,没有详细探讨译者的内心世界和认知行为。

另一方面,认知模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虽然借助了心理语言学成果,试图解剖译者的思维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翻译“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的流散状态。但总体而言,由于其理论基础是认知语言学,因此,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翻译模式、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上,而对翻译本质、译者主体性等诸多要素研究不够^[10]。此外,其实证研究方法 TAPs 也倍受质疑。有人认为,该方法所用的数据在收集过程中必然受到外部因素如实验环境、译者口述能力等的影响,同时研究者本身对数据的阐释掺杂了主观性^[9]。

由此看来,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从根本上未能摆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桎梏,因此,不能完整呈现核心主体——译者在真实世界中的翻译认知过程。即便是颇具影响力的贝尔“综合—分析”模式,仍然无法全面廓清翻译过程中译者连贯的双语解码或编码心理,无法贯通主体翻译心理与翻译行为,翻译效果等客体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也无法回答“外汉翻译与汉外翻译是否共享一个心理机制并经历相同的心理过程?以及制约译者翻译心理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培养健康、高效的翻译心灵?”等一系列问题^[26]。

实际上,翻译过程不仅是一种语言解码过程,更是一个主体间,主客体间交流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内外因相互交织的心理博弈过程。处于中心位置的译者,一方面要与原作者,读者及其他翻译主体间协商融合,另一方面译者自身也受到外部世界如文化心理,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与制约。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绝不当仅停留在语言层面或语言认知水平上,还应当考虑到非言语因素和译者这一关键角色。

1.2 译者主体路线

翻译过程研究,使以往隐形的无声译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从边缘走向中心。“译者主体”问题的提出与发展,为长期沉默隐身的译者去除了遮蔽,在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中消解了作者权威,为译者身份定位找到了理论依据。译者主体从奴仆到主人的身份建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传统语文学下译者主体的遮蔽、近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下译者主体的正名以及当代后结构主义思潮下译者主体的能动介入。

近年来,随着认知翻译学的兴起,学界开始在认知与译者主体研究中建立起某种关联,对译者主体的认知行为进行解读。为了更直观的呈现目前相关研究的特点,本文收集了近十年来该主题下的核心期刊论文40篇,经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2000—2011年近十年来“译者主体”路线图下的译者认知过程研究

Tab.2 Translator's Cognition by the route of subjectivity from 2000 to 2011 /篇

研究类型	元理论或 理论建构	译者主体认知过程研究			合计%
		社会文化认知	语言认知	译者主体认知	
宏观研究	32	3	1	0	36(83.8%)
微观研究	0	0	1	1	2(8.1%)
应用研究	0		1	1	2(8.2%)
合计%	32	1	3	4	40(100%)

1.2.1 主要成果

总体上看,译者主体研究中的宏观研究仍然占了多数。32篇论文中,29篇属于文化模式下采取不同理论对译者主体进行元理论研究或对译者身份,主体间性或主客体关系进行描述:基于阐释学理论的主体间视界融合^[27];基于互文性的文本参照^[28];基于后殖民主义的主体间身份阻抗与协商^[29];基于生态理论的主

体间选择、顺应与延异等^[30]。也有文章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地位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了译者主体性^[31-33]。另有3篇文章是对当前译者主体研究的回顾和反思^[34-35]。

文化模式下译者主体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从探讨视域来看,主要有译者主体意识,译者主体地位的界定(包括内涵和外延),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主体间性;从有代表性的切入点看,有从“创造性叛逆”谈起,从对翻译家的个案研究谈起,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从翻译规范谈起和从阐释学谈起;从澄清的问题来看,有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化研究凸显的必然产物,译者主体不等于翻译主体(翻译主体包含了作者、译者、赞助人、读者等其他主体),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的创造性,主体间性是指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或交互理性^[34]。

另外4篇宏观研究,则是从认知研究与译者主体相结合的产物:有的分析认知策略与译者主体性间的关系^[36],有的阐释体验哲学下译者的主体性^[37],有的探讨翻译教学中译者的主体认知^[38],有的讨论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关系^[39]。此外,从认知视角系统讨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初露端倪,段峰^[40]就专门讨论文化认知与身体体验维度下译者主体性的特点,并分析了认知语言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解释力。

译者主体研究的微观层面,主要是结合翻译过程,探讨译者在该过程中的语言认知和翻译决策:有的探讨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的个人特质如学识才情等的认知再现,也有的从语言学角度讨论译者的语言认知能力。相关的应用研究,要么是基于翻译名家的个案研究,要么是针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探讨译本中表现出的译者主体性及影响因素。另外,随着翻译的“认知升温”,近年来对译者微观体验的浅层研究不断涌现:有的关注译者思维、认知和心理;有的着眼于译者动机、态度和情绪;也有极少的描述译者本身社会性在翻译认知过程的作用。

总体看来,认知视角下的译者主体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它借助了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成果,使研究层面从以往对译者身份的宏观确立转向了对译者思维的微观探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它倾向于关注译者作为人的个人体验如心理活动,情感,情绪,态度,意图等对翻译的影响,并着重分析这些体验在译者双语转换中的处理策略;再次,相较于文化模式,认知模式的研究方法由于采用了TAPs, Translog和眼部追踪(eyes-tracking)等数据收集技术,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尽管实证研究在国内仍然较少,但毕竟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文化模式下的译者研究,在高调彰显译者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为其寻找了宏观的社会历史依据,而认知翻译学的出现,则使相关研究跳出了过度抽象宽泛的主体性哲学话题,纠正了将译者作为复数群体书写的片面性,成就了译者作为个体的特质,大大拓展了译者主体研究的理论半径。

1.2.2 问题与反思

文化模式下的译者主体研究,同该模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一样,无法跳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建构的樊篱中,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主体与对象,主体与客体或外部环境自在而自然的统一关系,不可避免的带有狭隘性和偏颇性。另外,由于其研究中心集体聚焦“谁是译者”和译者身份流变等问题,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译者“带着脚镣跳舞”的枷锁,但却忽略了身处一定社会文化中译者主体的受动性,即便是操控学派中有关译者主体地位的削弱,也仅限于从赞助人,意识形态等单一因素着手,没有详细阐述译者能动性或受动性背后错综复杂的思维影响因素,未能完整的勾勒出文化影响与译者心理之间动态的多维关系。

尽管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译者主体与翻译过程,文化意识等的密切关联,提出可以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以及翻译主体间性来研究译者主体性^[41]。还有的学者从翻译规范、意识形态、文化态度等角度探讨了译者主体在社会文化中的受动性和制约性,但基本上都属抛砖引玉的提纲挈领,概括笼统,有的甚至是一笔带过。由此看来,文化模式下的译者主体研究存在以下几大缺陷:将翻译主体等同于翻译主体性;忽视了对翻译主体受动层面的探讨;忽视了对翻译主体性受动层面的探讨;无视主体间性的制约性层面,仅强调个体主体的差异性,忽略复数主体概念的存在;夸大了主体间性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34]。侯林平^[35]也认为,目前国内译者主体研究的问题在

于,不仅仍将主体间内部关系至于关键位置,研究方法缺乏系统探讨,而且外部具体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缺乏将内部和外部关系整合的具体关系研究,因而导致翻译研究在“文化—人”以及“主体性—主体间性”的转向过程中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发展态势。

换句话说,以往对译者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研究,片面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处理,从根本上断绝了译者在文本活动中与客体世界的密切关联:一方面,译者本身一定会受到当前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译者实践的目的是为了“译作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不同主体(包括个人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等)的需要。”^[34]文化转向中的译者,被铁板一块地当作某种社会文化符号集体发声,其主体性是在与作者的对立中建构的,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与生活中有血有肉、激情四溢的个性译者相去甚远。

认知翻译学的提出,为深入细致地观察译者鲜明的内部思维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认知视角下的译者主体研究仍然以下主要问题。

首先,从理论视野来看,由于认知翻译学主要来源于罗宾逊的“翻译身体学”和莱卡夫(G. Lakoff)、约翰逊(M. Johnson)的体验哲学,而体验哲学又与认知语言学密切相关。因此,国内绝大多数认知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在认知科学大框架下的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模式,虽然在一些模式中,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中的相关概念被纳入其中,但总体而言,翻译的认知研究主要是研究语言之下的心智活动”^[39]。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则由于各种原因尚未真正纳入研究体系中,未能从根本上体现该研究的跨学科本质。对此,刘绍龙也一针见血的指出,“未能采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精华来作为现实翻译认知研究的指导框架”或“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来指导和解释翻译认知过程及翻译现象”,存在“取向单一”“视野狭窄”的不足^[42]。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认知视角下的译者主体研究关注的是译者的语言认知或“语言之下的心智活动”,忽略了语言之外的其他认知因素,如译者的文化认知,社会认知或社会心理因素等。这样一来,研究者有意无意将语言认知和社会文化认知隔离开来,阻断了语言与语言代表的外部世界之间的某种联系,使原本统一的认知整体断裂为两个不相干的过程,最终将导致翻译认知研究“由于缺乏理据的封闭性而妨碍了自身的发展”^[39]。另外,译者主体的认知研究虽然关注情感、情绪、态度等对翻译决策的影响,凸现了“个人体验”的价值,但却忽视了“观念体验”,即一定文化语境中社会成员共享的,为译者内化了的观念和价值判断。正如刘军平指出的那样,认知语言的体验性是共有的,客观的,译者主体认知应建立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主-客体关联。作为译者如何考虑主客体的互动关系^[43]。

再次,从学科话语建构来看,作为认知科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产物,翻译认知研究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认知科学如神经科学,脑科学,信息科学以及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话语,导致其概念表述和表达方式呈现出与翻译研究话语隔离的现象,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它的认同感^[39]。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认知模式下的译者主体研究,一方面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研究轨道,另一方面又尚未进入新的学术系统中,游离在翻译文化范畴和认知范畴的十字路口,处于尴尬而迷茫的境地。

2 启示与展望

作为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活动,翻译实践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认知,更是一种译者主体最终完成的认知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翻译过程研究还是译者主体研究或者翻译认知、认知心理学研究,都应存在“译者主体翻译认知过程”这一交集。通过对国内近十年来这一主题的统计规整,我们发现,这一研究主题大致聚焦于译者在翻译中的语言认知或语言处理上,是单一语言学视角下的信息处理模式。

显而易见,这一模式有它难以去除的弊病,它在肯定译者能动认知的同时,将译者主体的认知过程等同译者的语言认知过程,把译者心理简单归结为纯粹的语言心智,忽略了译者作为一个人的本质社会属性。换句话说,这种研究模式没有把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来研究,即译者作为一个“人”在翻译过程中与周围客体世界形成的多重关系,包括主体与客体,个体与主体,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其结果很可能使研究掉进入另一种形而上的哲学陷阱。难怪罗宾逊自己也说,当我们摆脱了作者与译者,原文

与译文的二元对立后,是否又落入了译者理性与情感、超验与体验的窠臼中呢?(罗宾逊,1991:xv)^[44]因此,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认知模式的建构,不仅应借助认知科学中有关语言认知的理论成果,而且还应将社会学、人类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作为指导框架,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关系网络”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认知,建立起一种“现实社会—译者—文本—其他主体—现实社会”的完整认知过程模式。只有把译者看成集合了语言认知和社会认知的过程实践主体,才能全面地解密真实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黑匣子”。

参考文献:

- [1] WILSS, WOLFRAM.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14.
- [2] 李占喜. 国内外翻译过程研究: 回顾与述评[J]. 时代文学, 2009, 11(8): 30-32.
- [3] 彭发胜. 融通化生---翻译过程的现象学描述[J]. 中国翻译, 2006, 25(5): 68-72.
- [4] 胡庚申.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 2004, 25(3): 10-16.
- [5] 胡庚申. 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24(4): 90-95.
- [6] 文军, 邓萍. 文化介入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J]. 外语学刊, 2005, 20(1): 81-85.
- [7] 金明. 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J]. 外语与外语佳教学. 2001, 24(8): 34-37.
- [8] 李占喜. 国内外翻译过程研究: 回顾与述评[J]. 时代文学, 2009, 11(8): 30-32.
- [9] 李德超.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 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05, 26(1): 29-34.
- [10] 颜林海. 西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概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6, 33(3): 116-119.
- [11] 黄国文. 作为语码转换过程的翻译过程[J]. 外语教学, 2009, 30(2): 83-87.
- [12] 王军. 论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J]. 外国语, 2002, (6): 57-64.
- [13] 郑冰寒. 翻译过程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J]. 上海翻译, 2008, 36(3): 36-40.
- [14] 陈科芳. 基于语用推理机制的翻译过程框架[J]. 中国翻译, 2010, 31(3): 12-16.
- [15] 姜秋霞, 全晓辉. 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 中国翻译, 2000, 21(1): 26-30.
- [16] 宋志平, 程力. 论翻译过程研究的心理认知视角[J]. 东北师大学报: 哲社版, 2006, 37(6): 128-132.
- [17] 唐建禾. 论翻译过程的元认知监控[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 23(4): 85-89.
- [18] 卢彩虹. 翻译认知过程与翻译偏差[J]. 上海翻译, 2008, 25(4): 18-21.
- [19] 姬玉珊. 翻译过程中源语对目的语的心理干扰性误差[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15(3): 46-48.
- [20] 袁卓喜. 试论语块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与启示[J]. 外语界, 2009, 22(5): 83-89.
- [21] 海芳. 翻译过程及其思考——TEM(2002)考生汉译英词汇策略研究[J]. 中国翻译, 2003, 24(1): 79-81.
- [22] 苗菊. 探索翻译过程与译者[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7.
- [23] 李占喜. 翻译过程的关联-顺应研究---文化意象处理举隅[D].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5: 10.
- [24] 宋志平. 选择与顺应---翻译过程研究的语用观视角[D]. 辽宁: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6.
- [25] 刘雅峰.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外宣翻译过程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8.
- [26] 刘绍龙. 论双语翻译的认知心理研究——对“翻译过程模式”的反思和修正[J]. 中国翻译, 2007, 28(1): 76-80.
- [27] 屠国元, 朱献珑.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 2003, 24(6): 8-14.
- [28] 周文革, 刘平. 互文性视角下译者主体性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9, 25(2): 111-113.
- [29] 龚禾敏. 论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 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J].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23(3): 86-91.
- [30] 刘国兵. 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外语教学, 2011, 32(3): 97-100.
- [31] 王友贵. 当代翻译文学史上译者主体性的削弱(1949-1978)[J]. 外国语言文学, 2007, 23(1): 40-46.
- [32] 胡安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译者的主体身份建构[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24(5): 103-107.
- [33] 赵志华. “生存心态”: 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理据[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 24(2): 79-82.
- [34] 胡牧. 主体性、主体间性抑或总体性——对现阶段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思考[J]. 外国语, 2006, 27(6): 66-72.
- [35] 侯林平. 我国近十年来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6, 8(3): 100-104.
- [36] 侯智德. 译者主体性与认知策略[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17(1): 92-94.

- [37] 万江松,冯文坤.“去蔽”却未“澄明”——体验哲学视角中的译者主体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35(3):267-171.
- [38] 郑小微.从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探索翻译教学中的译者主体性[J].外国语文,2011,27(1):97-102.
- [39] 段峰.论翻译理论研究的认知视角[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36(6):90-94.
- [40] 段峰.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J].外语学刊,2007,22(2):64-67.
- [41]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24(1):19-24.
- [42] 刘绍龙.中国翻译认知研究:问题、反思与展望[J].外语研究,2008,18(4):59-65.
- [43] 刘军平.重构翻译研究的认知图景 开创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26(4):88-93.
- [44] 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Retrospection of Translators' Cognitive Process Studies in China

Tan Su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overview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concerning translators' cognitive process studies from the cultur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through sample papers under the key words of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decade-long studies focus on translators' linguistic 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ut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non-verbal cognition on translating and therefore proposed that social psychology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constructing a complete model about translators' cognitive process.

Key words: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process; linguistic cognition; social psychology

(上接第16页)

Application of Moving Element Method in the Vehicle-Ballastless Track-Sugared Model

Wang Jian, Lei Xiaoya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Railway Environment Vibration and Noi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moving element method is extended to the dynamical analysis of slab tracks and a new model of vehicle-slab track-subgrade coupling system is presented. The whole model is only required to discrete into vehicle elements and slab ballastless track elements. Via moving element method, the associated stiffness matrix, mass matrix and damping matrix for track element are deduced for these track elements. And the vehicle element model has 26 degrees of freedom. Based on Lagrange equation, the corresponding stiffness matrix, mass matrix and damping matrix are formulated. This model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programming, efficient computing speed and eliminating border effect. The two different dynamic responses with and without track irregularity are investigated.

Key words: moving element method; finite element method; vehicle element; track element;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